

日本战败后的李守信（下）：兼论日文资料的使用

娜仁格日勒

（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正如在其自述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李守信“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其典型意义不仅体现在“满洲国”时期的种种行为上，也充分表现在日本战败撤走后，李守信坚持自己的立场，支持德王的独立运动。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对于其 1945 年以后的活动进行还原，包括从担任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到蒙古自治政府蒙古军副总司令，追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逮捕引渡给中国，1970 年去世，骨灰的管理等内容。

关键词：李守信；德王；蒙古自治政府；中国共产党；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G75

文献标识码：A

一、1949 年在阿拉善：德王的忠实追随者

8 月，蒙古自治政府在阿拉善成立。不久，被迫向西北移动，到达接近边境的拐子湖。其后，李守信等人追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在宁夏：寄人篱下

1948 年 12 月-1949 年 1 月间，董其武下令将新骑 1 旅^①和宝贵廷的第 3 总队都归宝贵廷指挥。此后一段时间，宝贵廷部队一直在厚和附近。

1949 年 5 月，宝贵廷为投奔德王，率领部队西移固阳。经乌拉特中旗同义隆等地，7 月到达宁夏布隆淖尔。由于给养困难，经宝贵廷、李守信与马敦静交涉，新骑 1 旅由宁夏收编，暂归宁夏军阀马敦静（马鸿逵次子）指挥，给养等一切由宁夏省负担。但是，马敦静只允许宝贵廷率蒙古骑兵驻在黄河以东的陶乐县，不许进入黄河以西的阿拉善地区。^②

8 月 10 日，德王和李守信组织的蒙古自治政府在定远营正式成立。李守信被选为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宝贵廷从部队中选派内蒙古东部和察锡各旗的代表洛布登，乌尔塔，诺尔布达那等 30 多人，前往定远营参加成立大会。

此间，李守信和乌古廷在宁夏与马敦静多次交涉，请求允许宝贵廷部队进驻定远营，马敦静不予答应。不久，马敦静以兰州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名义，任命李守信为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率领新骑 1 旅归宁夏兵团指挥。李守信当即表示反对，而马敦静以这是马步芳的命令来压制李守信。8 月下旬，李守信有意去绥远，但是此时傅作义已来绥远，此次，傅作义仍坚决拒绝李守信来绥。^[1]关于国民党军阀傅作义的大汉族主义及其对少数民族的极端歧视和残酷压迫，从他与欧文·拉铁摩尔的一段对话可见一斑。拉铁摩尔非常谨慎地讲述蒙古自治的问题，“听到这里，傅作义忽然破口大骂道：‘蒙古人里没有像你我这样的文明人。蒙古人不是人，他们是牲口。如果他们干活，就喂养他们。要是不驯服，就揍他们’”。^[2]

此时，解放军向西北进攻，宁夏形势紧张，吴鹤龄、札奇斯钦、德古来、乌古廷、乌臻瑞等先后飞往台湾。不久，马敦静令李守信部队去三边（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打游击抵抗共产党军

队。李守信用上身仅有的现洋 8 元买了口小猪让官兵吃了一顿肉，带部队向三边出发。后又接到马敦静的命令回到陶乐县。李守信率部队退回陶乐县时，仍有人率队伍前来投奔，均被李守信拒收。

[3]

（二）被捕：从阿拉善拐子湖到蒙古人民共和国

9 月中下旬，绥远、宁夏相继被中国共产党军队占领，李守信率部沿黄河东岸向北，后向西渡过黄河到磴口，向定远营方向去寻找德王。行至距离定远营 200 里处时，碰见洛布登前来寻找李守信，得知德王已于 9 月 20 日离开[4]定远营前往阿拉善北部的图克木庙（Tühüm-ün sūme），便也向那里进发。德王在途中听闻李守信也在向图克木庙行进，便宣布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副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总司令部下设 2 个师，第 1 师师长苏和巴特尔，副师长孙明海；第 2 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军队共一千多人。[5]

10 月初，李守信抵达图克木庙。这时，德王一行已先行到达，且已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哈拉格（Qara ergi）③与蒙古内防处次长巴雅尔见面。德王返回图克木庙后，由于给养困难，经过与阿拉善旗保安队长派遣的代表阿拉善旗北部防卡队长段塔拉腾岱等人协商，德、李决定向西北的额济纳旗境内的拐子湖（Gorunayi gool）移动。11 月底率部向西北行进到巴伦沙尔札（Baragun sharja-yin sūme），后抵达拐子湖。

12 月 29 日，德王来到察干套老盖（Chagan tolugayi）与蒙古方面的巴雅尔再次会见。临行前，一切交由李守信负责代理，约定以 21 天为限，德王一定回来。德王出发时，蒙古自治政府的所有军政首脑人员都出来送行，一一握手，李守信对德王说：“你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好好地联络吧，我也打算去，就是栽跟头也栽在蒙古地方，决不栽在八路手里”。过了一个多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送来德王信件，指示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等 6 人来边境察干套老盖开会。[6]途中，德王又来电，指示李守信等改去乌兰巴托开会。④李守信一行到达乌兰巴托后被捕，1950 年被遣送回中国。[7]

从台湾返回到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期间，李守信一直有机会重返台湾，然而他没有选择离开。

二、特赦后的李守信生活点滴

引渡给中国后，李守信一直被关押，直到 1964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特赦令，认为李守信“经过改造，确实已经改恶从善”，予以释放。距离 1950 年被引渡中国后，已经过去了近 15 个春秋的岁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于 1964 年 7 月 31 日制作的《战争罪犯处理报告表》记载，释放前的李守信被关押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内，表中还记载，李守信军衔为上将。

获释的李守信和德王一样，被安排在位于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自从 1945 年 8 月到达北平时起，到 1949 年 8 月在宁夏辗转之际，李守信一直希望重新回到厚和率领蒙古军，终因傅作义的阻挠未能实现。被引渡回中国后，实现了他的愿望的一半，回到了厚和，却是今非昔比。文史馆给李守信配备了秘书刘映元。但刘映元也已去世多年，但笔者仍怀着一线希望，多方打听与李守信有过接触的人员，最后找到了一位知情人，进行了采访。

2015 年 8 月 21 日，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机关办公楼 6 号楼）会见该馆馆员李先生，访谈了李守信当年的情况。李先生的父亲是文史馆员，双目失明，上下班时由李先生陪伴来往于住处和办公室之间，经常见到李守信。那时虽然年龄尚小，但还是有一些记忆。以下是李先生的回忆：

李守信是位非常和蔼慈祥而且健谈开朗的老人，身高大约 1 米 8 左右，比较魁梧，但是，由于腰腿疼，走路时需要拄着双拐，上身向前倾斜大约成直角，从来没见过他直腰。在家里时，习惯坐在炕上，拐杖总是靠炕沿竖立停放。李守信一个人生活，在我们看来，经济上比较富裕，经常给孩子们一些糖果之类，孩子们都特别愿意去他家里，因此，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李守信住处是平房，有个小院子，三间房，中间是客厅，东屋相当于书房，西屋有南炕，炕上放个炕桌，冬天生炉子取暖（这与李守信自述附录中的描述基本吻合——笔者）。手上戴着块非常好的手表，还有支派克笔。有个新城满族人给他挑水倒垃圾。李守信的工资不怎么花，总是顺手放在褥子底下。

李守信对于监狱里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说喂兔子是他在监狱里唯一的工作。文革中，人们都躲避这个特殊人物。文革结束后听人们议论，其实，李守信是个非常灵活、务实的人，并不固执。

在文革时期，人们虽然对他敬而远之，但没人敢惹他。据说，有一次，从东北来了两个干部，一男一女，来做外调，也就是向李守信调查询问被调查者的历史情况。那个女干部也许已蛮横成性，不知深浅地对李守信说“你老实点”，被激怒的李守信拿起放在炕沿边的拐棍就要打那个女干部，被同来的男干部劝阻。后经男女干部赔礼道歉，才算了事。

还常听李守信给人们讲，从他住的江南馆巷到文史馆的路上，经过街心花园，路倒是并不远，但因腰腿疼痛，总是在公园的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一天，两个小偷企图抢劫他的手表，被李守信用拐杖打跑了，“虽然虎落平川，但不能被犬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不看看老子是谁”。

笔者还向李先生询问了关于李守信在日本战败后的选择的问题，他指出，他记得李守信也说过，当时，他并不知道共产党和傅作义有什么区别。^⑤

三、骨灰的安置：李守信堂孙访谈

李守信于 1970 年 5 月去世，那么，他的骨灰去了哪里？在他的家乡会不会有其亲属？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5 年 8 月，笔者到辽宁省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大庙村采访了李守信的堂孙李贵民。李贵民家看上去与其他人家并无二致，但是，家里珍藏摆放的李守信与德王的合影照片却表明了他的身份（照片 4）。李贵民，1954 年 5 月出生于大庙村。大庙村即李守信的出生地，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古力古畜大庙村，而现在，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力古畜这个名字，只称为大庙村。村落四周有帽子山等山脉环绕，山势不高，郁郁葱葱，长满了各种树木草丛，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

李贵民称李守信为老爷，即最小的爷爷。下面是李贵民的讲述。

我的祖父李君，是李守信的大哥，二哥叫李臣，李守信排行老三，也是兄弟中最小的。李君有三个儿子，长子李景阳，次子李景堂，三子李景荣。李景堂曾留学日本，因为是个强烈的反共共产党分子，土改时被枪杀。^⑥我父亲李景荣有四个儿子，大哥在大连，二哥去世早，43 岁时病故，我排行第三，四弟在沈阳。

李守信的三个儿子李景凡、李景芳、李景元都在台湾，现今虽年事已高，但都健在。大陆和台湾关系缓和后，台湾方面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李守信去世后，王治平将骨灰接到北京（当时唐成良也已去世），1971 年清明节时北京的大堂哥把骨灰送到大庙村，安葬在这里。李守信终于又回到了故乡。2000 年 10 月 5 日，李守信的两个儿子李景凡和李景元从台湾来到大庙村，祭拜父亲，并立了墓碑。

李守信的墓地在在大庙村西面大约 400 米处的小山洼上，守望着村落。站在墓地旁，整个大庙村尽览无余，隔过村子，可以望到对面的帽子山，即李守信的坟墓与帽子山隔村相望。墓地有 1 个石碑，4 个土坟（照片 5，6）。阴历 7 月 15 日刚刚祭过，所以坟头上还压着崭新的纸钱。石碑是李景凡和李景元于 2000 年建立的，上面镌刻的“永世怀念 李氏宗親之靈墓”（墓碑左侧刻有“公元二千年”、右侧“北票市馬友营乡大庙村”）的碑文也是李景凡的手迹。站在石碑的旁边，面向土坟，左手前面是李守信的坟墓，后排是李贵民的父母，右手前面是李贵民祖父祖母，后排是李贵民的大伯的坟墓。

李贵民的家（照片 7）住在从北票通往小塔子的长途汽车公路西面约 150 米处。紧挨着公路的东侧就是李守信的故居，在大庙商店北侧，建筑早已形影无踪，现在是别人的住地。李贵民回忆，古力古畜大庙也被毁坏，其位置就在公路西侧，与李守信的旧居仅隔一条公路，非常近，距离李贵民的住家只有 100 米左右。

他还告诉我们，当地的地名中带有“营”字的过去是蒙古族村落，带有“沟”字的是纯汉人村落。而现在，即使名义上是蒙古人的村落，也都已汉化，蒙古人也都不会讲蒙古语了。他们的村子有 100 多户人家，500 人左右，蒙古族约占一半，而会讲蒙古语的只有几位 80 多岁的老人了。

在交谈中，李贵民讲得最多的是在文革中遭受的辛酸苦难。之所以遭到欺压，只因为李守信的后裔。在这里，摘录其一小部分。

“父亲李景荣生于 1914 年，大房太太生下一女后去世。父亲于 1947 年娶了第二个妻子，即我的生母。母亲刚嫁到李家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北票开始了土地改革。因为我们李家是村里的首富，加上李守信的缘故，便成为土改的第一个对象。我们家族为了躲避风险，都去了北京投奔李守信，但是，没过多久，北京也乱了。

解放后，我们被赶回老家。回家时一家 4 口人，奶奶、父母和姐姐，母亲有身孕怀着大哥。回到了家乡却没有住处，原来的家产和土地早已全部被没收，分给了贫农和贫下中农们。我们真正成为了一无所有的赤贫。一家人轮流借住亲戚家，没有人愿意收留地主家庭，因此不得不经常搬家。母亲生大哥时暂住一个远方亲戚家。当时，人们都躲着我们，担心引火烧身，惹上麻烦。大哥比二哥大 3 岁，二哥比我大 2 岁，有一个妹妹，四弟是 1963 年出生。

父亲因吸食大烟身体不好，于 1963 年去世，当时我只有 9 岁。弟弟还小，上面的兄弟 3 人给生产队放羊。大地主的老婆家庭成分不好，又死了丈夫，孩子们幼小，没有家住，借宿人家，母亲的艰难辛酸可想而知。白天都去劳动，母亲也必须参加劳动，晚上被叫去‘学习’。名义是‘学习’，实际上是批斗，地主的老婆孩子，被批斗是理所当然的。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受尽欺辱，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比肉体上的折磨更为痛苦的是心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遭受无端的指责、欺负和虐待，倍受孤独、被排斥的煎熬。我只读到小学 2 年级，被迫辍学。其实，我们有什么过错呢？我们没做过任何坏事。”

在采访中，李贵民多次感叹“没有知识是最可怕的，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是我不愿意学习，是没有机会”。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李贵民一直说不上媳妇。文革结束后，于 1978 年至 2003 年在村里当会计，1982 年才结婚，在农村属于少有的晚婚。

李贵民性格开朗，为人诚实热心，因此，文革结束后，村子里也曾打算让他当小学教师。但是，只读过 2 年级的他觉得自己无法胜任。他还告诉我们，母亲一生遭受了无尽的灾难和委屈，却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于 1978 年去世。在采访过程中，我感受到，命运多舛的李贵民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机智的人。

四、李守信在德王政权中的作用

如何评价李守信，是个难题。原因在于他的经历比较复杂。他是德王政权的 2 号人物，先后与日本、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要员打过交道，曾经叱咤风云。同时，他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刘映元指出，他在一生中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身上没有留下一块伤疤，不得不说是个奇迹。^[8]日本撤退后，李守信受命为国民党奔走，最后在 1949 年初夏，出于德王的要求，从台湾回到内蒙古，追随德王重组蒙古自治政府。

其实，无论在早期还是在 1949 年的蒙古自治运动中，李守信在德王政权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早年的“察东特别行政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1933 年 2 月 21 日，热河事变（热河战役）爆发，3 月 4 日，汤玉麟不战放弃省会承德，热河全境沦陷。3 月 5 日，崔兴武在林西将部队交给李守信。4 月初，李守信部队被日本关东军改编为热河游击师。^[9]5 月初，李守信赶走占领多伦的刘桂堂军队，进入多伦^⑦。8 月，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李守信在多伦设置了“察东特别行政区”，任行政长官，“满洲国”派遣顾问协助统治。这一“察东特别行政区”即李守信军政府便

成为日本方面“内蒙工作”的据点。随之，李守信部队于9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规模9千人左右。^[10]

原本，“满洲国”与占领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军阀宋哲元第29军经常发生摩擦，察东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尤其是进入1934年以后，双方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在这种情势下，1935年1月，日本决定改变以前的以培养亲日势力为主的政策，转变为扶持成立地方独立政权。1935年12月，发起察东警备军进占察北六县的“察东事件”（六郡事件），12月31日，李守信军占领张北（照片8）。1936年1月22日，在张北成立了以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扎布（卓世海）为中心的察哈尔盟公署。^[11]1936年2月10日，在察哈尔盟公署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12日，蒙古军政府成立。有观点认为，蒙古军政府的基础便是“察东特别行政区”。^[12]李守信曾两次访问日本^⑧，并在一些重要讲话中明确表示对日本的依靠，指出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蒙古军队正在不断强大。^[13]

“察东特别行政区”是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以及蒙古军政府的重要基础之一。李守信也承认，“那时在关东军卵翼底下，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察东警备军”。^[14]在德王政府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李守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守信与德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涯始终是紧密联系相随相伴的。李守信作为德王政权军队的实质上的最高指挥者，不断摸索强化军队的各种方法，并尝试发行军队刊物《铁壁》（照片9）。

1945年以后，追随李守信的部队中，有不少是其旧部下。例如，李守信带领旧部下刘继广和郭秀珠前往东北出关组织人马时，原蒙古军第3师师长宋鹏九也追随李守信到热河和开鲁，被任命为师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他在蒙古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15]

李守信的祖籍是山东，然而几代人生活在蒙古地区，成为了“随蒙古”。^[16]他在1933年以后尤其是1949年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表现出他是一个极端的反共的民族主义者。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他的意识接近汉族”。^[17]由于资料的欠缺等制约，对于李守信尚不能进行全面的叙述，但是有两点值得深思。第一，关于镇压嘎达梅林起义。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如何叙述的，其详细情况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谜，而他在晚年为什么特意交代镇压并枪杀嘎达梅林的真相呢？或许是因为他长期经历了国民党军阀大汉族主义的欺凌和压制之后，对于血气方刚、鲁莽的年轻时代有了反思和悔悟。他自己也承认，得知起义的真相后“感到非常后悔”。^[18]第二，1949年夏，德王身边的不少人员纷纷离开大陆逃往台湾等地时，李守信却选择了留下来，顽固到最后。

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难以一言以蔽之，正因如此，更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才能够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注释

①此时安恩达任新骑1旅长，苏和巴特尔、孙明海为副旅长。

②德旺自述，第170页；卢明辉：《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蒙古自治运用始末》，中华书局，1980年，第380页。

③德王与蒙古方面原先约定在乌盟境内的巴彦山丹（bayanshangdu）会见（德王自述，第192页）。

④《伪蒙古军史料》，第187页。德王在自述中指出，李守信一行到达乌兰巴托后，蒙古方面并没有通知德王。德王和李守信等人在乌兰巴托的见面是在被逮捕后审讯时的对质作证（德王自述，第207页）。

⑤可以与《李守信自述》第340页等内容相对照。

⑥1949年3月17日，阿鲁科尔沁旗罕庙努图克牧民拉喜拣粪时遇见一个骑马人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便将骑马人骗到家里，与村里的共产党公安人员一起盘问出此人名为义萨布，汉名李景堂，是胡图凌嘎的参谋长，缴了义萨布的两支枪和两匹全鞍马，逮捕了义萨布。义萨布是李守信的侄子，曾任伪满骑兵团副、师参谋，国民党骑兵总队少校。

辽沈战役后加入胡图凌嘎队伍，任参谋长。因此，可以推测，李景堂应该是在此次被捕后被处死。

⑦李守信部队占领多伦后，于7月12日将多伦让给冯玉祥、吉鸿昌“抗日同盟军”一个月，8月11日又夺回（李守信自述，第131-135页）。以李守信做自述时的处境，可以判断这一回忆细节应该属实。

⑧关于第一次访日时间，李守信自述中认为是1939年的春夏之间（《李守信自述》，第299页），德王认为是1938年秋（《德王自述》，第79页）。第二次访日时间，李守信和德王都认为是1941年2月11日从张家口出发（李守信自述，第308页；德王自述，第107页）。

参考文献

- [1]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伪蒙古军史料[M].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8辑, 1990. 181.
- [2] Owen Lattimore, Compiled by Fujiko Isono. CHINA MEMOIRS, Chianm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M].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25-26.
- [3]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伪蒙古军史料[M].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8辑, 1990. 181-182.
- [4]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M].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 1984. 173.
- [5]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M].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 1984. 173-174.
- [6]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M].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 1984. 188-200.
- [7]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编. 内蒙古公安厅边防史料 1950-1985[M]. 1989. 141.
- [8]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守信自述[A].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C]. 1985. 353.
- [9]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守信自述[A].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C]. 1985. 121-127.
- [10]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守信自述[A].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C]. 1985. 135-136.
- [11] 島田俊彦, 稲葉正夫編.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M]. みすず書房, 1964. 492-500.
- [12] 稲葉正夫. 関東軍の内蒙工作（二）[A]. 国防[C]. 昭和38年5月号, 第80页.
- [13] Köke tuγ qoriya. 89düger quγ uchaγ a[M]. 1943. 1. 13.
- [14]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守信自述[A].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C]. 1985. 139.
- [15] 松井忠雄. 内蒙三国志[M]. 原書房, 昭和41年. 142-145.
- [16]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守信自述[A].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C]. 1985. 2-3.
- [17] ドムチョクドンロブ著, 森久男訳. 德王自伝[M]. 岩波書店, 1995. 509.
- [18]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李守信自述[A].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0辑[C]. 1985. 98

Li Shouxin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 on the use of Japanese materials

arangerel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As in the readme clearly pointed ou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Inner Mongolia, Li Shouxin "is a fairly typical villain". The typical significance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Japan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all kinds of behavior, also manifested in the defeat of Japan after the withdrawal, Li Shouxin insists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support of De Wang (德王).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 data, the 1945 after activity reduction, including serving as the chief of the Kuomintang army from tenth to the Mongolia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Mongolia Army Deputy Commander, follow De Wang(德王)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after being arrested for extradition Chinese, died on 1970, the ashes of management et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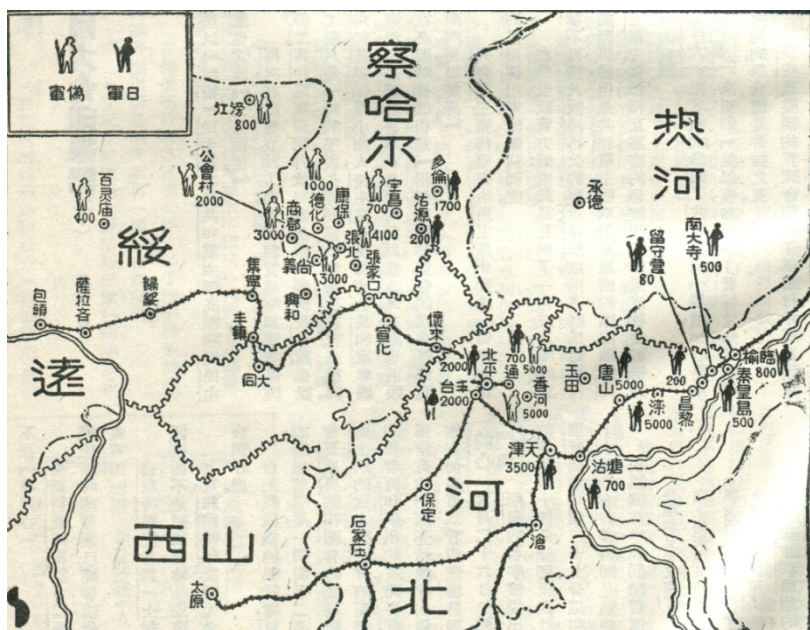
Key words: Li Shouxin; De Wang; Mongolia autonomous governme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Kuomintang

收稿日期: 2017-10-15;

作者简介: 娜仁格日勒 (1966-), 女,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蒙古与日本的关系。



照片 7 李贵民家



照片 8 察北驻军图（韜奮主编《生活星期刊》第 1 卷第 22 号，民国 25 年 11 月 1 日）



照片 9 Temür kerem（铁壁）创刊号封面

